

# 王蒙 | 轻舟已过千重雾

日前,著名作家王蒙来到上海图书馆,为上图馆庆60周年“大家讲坛”担任首讲嘉宾。他主讲的题目很新颖:“中国天机”。看上去,这不像一位作家所涉猎的领域。不过和往常一样,“愈老愈精神”的王蒙滔滔不绝,讲得精彩纷呈,讲座后,他接受了生活周刊记者的采访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资料

## 用个人经历,解读“中国天机”

生活周刊:您的新书有一个宏大且给人以广阔想象力的名字——“中国天机”,能否解释一下?

王蒙:我们知道,从194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其间中国的各种运动频繁,群众也得到了广泛动员。我力图挖掘这些运动之所以能发动起来的深层原因,这就是“天机”。另一层意思是,我发现,被动员起来的群众,更多的时候是考虑自己的利益,而非理论的出发点。在书中我把这一发现表达了出来,这也算一种“天机”。

生活周刊:不过您很少讨论类似于“中国天机”的话题,《王蒙自传》涉及诸多文坛内幕,但也不像这次那么直接。

王蒙:我确实很少在作品中涉及如此公共的话题,所以出了这本书后,大家纷纷猜测。其实我也有感触。我发现,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对公共领域、公共事务投入的关注最多,渴望以文学介入现实。比如秘鲁的略萨,还参加过总统竞选,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也曾积极参与公共事务。

但我的想法很简单,就是表达我这几十年人生的命运、经验和感受。我不是社会学家,书中更多的是根据我的切身经历所做的生活追忆和论述,表达一个作家对时代变迁的看法。骨子里我就是个作家,写东西不教条,我是一个热爱文学创作的人。

## 面对时代,不要自乱阵脚

生活周刊:您受过不公正待遇,被下放劳动。但有趣的是,您自己选择去了相对艰苦的新疆,而且念念不忘,今年初还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谈起那段往事。

王蒙:其实1962年我已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书,工作、生活很稳定。但我并不甘心。为什么呢?因为当时我觉得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,投入火热的生活,到边疆锤炼自己。我信奉的是知识分子要经风雨、见世面,在边疆、农村中得到磨砺。作为一个作家,这也有利于塑造个人的写作风格。

生活周刊:所以,您从未放弃过写作,书写是您的生存方式吗?

王蒙:应该说,书写是我最擅长的生存方式,但不是唯一的。我认为,没有任何好事是作家不应该做的,因为作家同时还是人,是公民、社会、民族、家庭的一分子,有他的道德感与使命感。有些时候,知识分子对自己认定的事就必须去做,做不成也要做。

生活周刊:但是多年前您说过,“知识分子争名逐利是国家之福”。

王蒙:我前面说知识分子做自己认定的事,并不是指折腾。相反,我认为近160多年来中国太动荡了,这缘于国人对社会的批判够狠,建设却太少。所以,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要求,就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,通过改进、改革来达到更好的社会,而不是疾风暴雨式的断裂。

生活周刊:这是您自己的观点,还是知识界的普遍认知?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?



## 王蒙

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。作家、学者,曾任文化部部长。年轻时以中篇小说《组织部来的年轻人》一举成名,后历经坎坷,成长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家之一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《活动变人形》等近百部小说。



**我的想法很简单,就是表达我这几十年人生的命运、经验和感受。我不是社会学家,书中更多的是根据我的切身经历所做的生活追忆和论述,表达一个作家对时代变迁的看法。**

王蒙:应该说知识分子是有共识的。20世纪八十年代,很多知识分子渴望非常大的改变。十几年后,面对整个体制的有效运转,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在现行体制下做出对社会、对民众有利的事情。这种与社会与本民族文化的“和解”是相当务实的。因此我提出,渐进改革和务实建设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姿态,不要自乱阵脚,这样才能参与精神生活的拓展、参与中国文化的提高和弘扬。

## 说我圆滑的,都不了解我

生活周刊:关于传统文化这两年您谈得很多,也出了许多书,比如《老子十八讲》《老子的帮助》《庄子的享受》等,那您如何定义“传统文化”?

王蒙:这个问题很大,简单来说,传统文化包括三个方面。它首先是汉字文化,重视书写和事物之间的关联。例如从“牛”字派生出牛奶、牛肉、牛毛,又区分出黄牛、水牛等等。这在其他语言中是少见的。它反映了中国古人的求实精神,追求一种思维秩序与社会秩序。其次,传统文化是个泛道德主义的文化,强调人伦关系,主张克制欲望和竞争,走向和谐。第三,中华文化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,鼓励勤俭,强调刻苦和奋斗,所谓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对耽于享受的人进行批判。

生活周刊:但我们毕竟生活在当下,传统文化难道不会成为现代化的一种障碍吗?

王蒙:我恰恰认为传统文化较易与现代性接轨。你看,中国人是务实的、鼓励奋斗的,这就容易接受“发展是硬道理”的思路,不会敌视科学技术。相反,那些消极懒惰、不求上进的文化,才是现代化的阻碍。另外,传统文化又是强调伦理的,这对医治浮躁心理、欲望膨胀、恶性竞争这些“现代病”,是有意义的。而最重要的是,传统文化维护了中国的延续和统一,帮助我们渡过了重重难关。

生活周刊:那您怎么看待国学热、读经热?

王蒙:我是有很大保留的,要我看,这是自己蒙自己(笑)。你认为可能靠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把社会搞好吗?难道读一遍《红楼梦》、读一遍《三国演义》,再读一遍《水浒传》,中国就搞好了?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老祖宗的东西什么都好,孔子、孟子、中医、气功,我们什么都有,这种人本身就没救!儿童读经我更反对,教育包含语文、体育、数学、科普等各方面,不能用读经来代替。半部《论语》治不了天下。

生活周刊:我觉得您已经到了“见招拆招”的境界,说话圆满、逻辑自洽,对任何质疑都能回答得天衣无缝。这就是您的处世哲学——“中庸之道”吗?有人说你圆滑、世故。

王蒙:谢谢(笑)。我不否认我是一个中庸者,这是中国国情和中国的文化所造成的。中国人不管搞政治、搞经济,都强调中庸:留有余地,过犹不及。这里隐藏着一种智慧,即不急于做价值判断,而是先搞清楚真实情况是什么、为什么会发生?鲁迅打过一个比方,说人们看到一块匾,还没看清楚写的什么,就为字好不好打了起来。这是最悲哀的。说我圆滑世故的,都不了解我王蒙,他们太浅了,想不到这一层。我呢,用我自己写的一句诗形容,就是“轻舟已过千重雾”。